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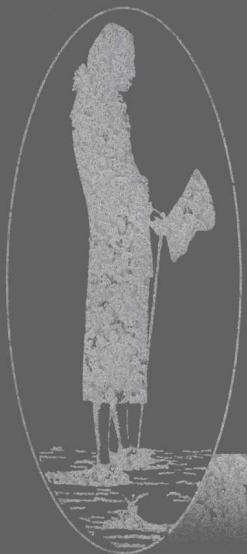
書·畫·影·微·博·網·站

形而上者  
惟聖人能之

《周易》

解卦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

《纯粹理性批判》上半部注释

[英] H·J·裴顿 著

韦卓民 译

高新民 整理

2009年·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上半部注释/[英]H·J·斐顿著;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  
(韦卓民:康德哲学著译系列)  
ISBN 978-7-5622-3750-1

I. 康… II. ①斐… ②韦… III. 康德, I. (1724-1804)-形而上学-研究 IV. 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0899 号

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上半部注释

Kant's Metaphysic of Experience

A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Half of the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英]H·J·斐顿 著  
韦卓民 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责任编辑:沈继成

封面设计:甘 英

责任校对:张 忠

督印:章光琼

---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37.25 字数:1000 千字

版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89.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H. J. Paton*  
Kant's Metaphysic of Experience  
A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Half of the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935

### 内 容 提 要

苏格兰康德哲学研究专家 H · J · 裴顿的《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是一部非常重要、极有价值的著作。在本书中，裴顿努力深入到康德思想的创作过程，“设身处地”，对康德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上半部作出了细致入微、精辟入里的分析和解读。更为难得的是，他独辟蹊径，对康德哲学提出了与康蒲·斯密等人的传统看法大相径庭的阐释。这对我们深入研究康德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 出版说明

韦卓民，这位博学多才的老一辈学人，在中外哲学史、逻辑、教育和宗教神学等众多领域中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硕的建树。据不完全统计，他留下的遗著近一百种，达七八百万字。令人痛惜的是：这些价值连城的学术著作中，至今仍有相当大一部分未曾面世。

韦先生平反后，其子宝锷先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将遗稿全部捐赠给华中师范大学，希望早日公之于世，以慰父亲亡灵。当时的校领导很重视此事，立即成立“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负责此项工作。90 年代初，经过多方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之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整理后的韦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自然科学研究初步》两本书出版，受到学术界有关人士的欢迎和好评，被誉为哲学史界的一件大事。随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5 年）和作为桂岳书系之一的《韦卓民学术论著选》（1997 年），再次引起很大反响，后者出书不久，即告脱销，这更激起大家对韦老遗著早日面世的渴望。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鉴于此，乃下大决心按系列陆续出版韦先生的各种遗著。两年内首先出版关于康德哲学的系列。这真是一桩令人欣慰的大好事，是出版社具有远见的决策。它不仅将有力地推动对康德哲学思想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必将拉动包括港台在内的祖国文化界和海外有关人士对韦先生学术思想研究工作的进一步

开展。韦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即饮誉海内外<sup>①</sup>，解放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大陆销声匿迹，而在港台，在域外，对他的研究却始终没有中断。1993年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均谈到这个问题。台湾一出版商曾拟购买他关于康德译著的版权，香港一位学者曾与华中师范大学联系合作编著他关于宗教神学方面的文集，这充分表明各方对韦卓民学术思想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韦先生关于康德哲学的遗著，数量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质量堪称上乘。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已有所评论。本人谨就与韦先生接触中所见所闻及在整理韦先生遗著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对他在康德哲学研究中的某些情况和特点，作一个粗略的介绍：

第一，西方哲学史上，韦先生着重研究了四个人，即亚里士多德、培根、康德和黑格尔。关于这四位哲人，他均有遗著留下，但花时间最长，耗精力最多的乃是康德。他推崇康德是马克思以前在西方哲学思想发展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最关键人物。因此，研究西方近代哲学史的人不管谈什么哲学问题，都必须追踪到康德。记得60年代初，韦先生给我们几个中青年教师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时，我隐约地觉察到他讲康德时经常流露出一种激情，这是他讲黑格尔时所没有的。他曾向王元化先生讲过，他对康德的评价远远超过黑格尔。当然，在那极“左”的年代里，他在称颂康德的同时也曾从政治角度斥责过康德几句，这是可以理解的。

<sup>①</sup> 抗战胜利后，韦先生应邀在美国各大学巡回演讲，介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随后集成专著《中国文化的精神》（1947年在纽约出版）。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K.S. Latourette称赞韦先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业绩时说：“在这方面很少人能和韦先生相比，也没有人超越他。”韦卓民是美国“鲁斯教授”这一荣誉称号的第一个获得者。在中国宗教神学界，早在解放前就流行着“南韦北赵”的赞语，意即南方的韦卓民与北京燕京神学院院长赵紫宸同为宗教神学界的台柱，南呼北应，相得益彰。

韦先生于1957年突遭厄运后，从居住几十年的校长楼中移居一间斗室，工资陡降，生活条件急剧变差，但他从容对待，一心扑在对康德等人的研究上。到“文革”前，数年内以惊人的速度译出有关康德的专著竟达十部，共三百余万字（同一时期，韦先生还撰写和翻译了四本关于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等方面的著作达一百万字左右）。这是他在康德的研究中成就最多的时期。商务印书馆慕其名向他约稿，由于“文革”爆发，只出版了四部。此后十年，这位耄耋老人在蹲牛棚、下农村、挨批斗、受凌辱等更为恶劣的境遇中仍念念不忘康德、黑格尔，思索不已，笔耕不辍。在那令知识分子濒于崩溃绝望的岁月，他却向同时遭劫的难友说：“要有信心，做学问不能停下来！”表现出一个智者的坚韧与从容，这种精神风貌，实在令人惊羡不已。

第二，他认为，要真正认识康德哲学一定要读原著，特别是他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是康德哲学思想的精髓，故康德哲学又称“批判哲学”。韦先生曾著文专门分析“三大批判”的前提、基础和背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三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批判》是重中之重，代表了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五六十年代，他在“康德哲学讲座”上，主要讲的是《纯粹理性批判》。他着重分析了该书的主题思想“验前综合判断怎样成为可能的？”这一命题的理论来源、内容实质和解决途径。他为了帮助国内学子更好、更深入地学习这部名著，决心知难而进，重新翻译这本最难读的书，以克服当时已有的两个旧译本中不实不妥的缺陷。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两位英国学者讲解《纯粹理性批判》的两本专著，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康蒲·斯密）和《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H·J·裴顿）；特别在“文革”前夕，翻译了康德为《纯粹理性批判》所撰

的简写本《一切未来的形而上学导论》。这都说明了他对这一名著的异常重视和对读者独具匠心的负责精神。

韦先生对整个康德哲学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发掘和研究，寻找这一思想发展的脉络，探讨“批判哲学”的形成背景与条件。他认为在“前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已可窥见“批判哲学”思想的萌芽及产生的过程，并确定“批判时期”与“前批判时期”的界碑，从而把两个时期有机地统一起来。根据韦先生的见解，科学家康德是哲学家康德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哲学大师康德，也就没有宏伟的“批判哲学”体系。

第三，韦先生关于康德研究的遗著中，绝大部分是译著。在翻译康德的哲学著作中，他突出的特点是：把研究寓于翻译之中，翻译的过程也就是他的研究过程。多年来我参加整理他的遗著，对这一特点的体会愈来愈深。当年听他讲康德、黑格尔哲学时，对一些重要概念、词语，他总是反复地从结构、词根讲到语义，从英文德文追溯到拉丁文，那时觉得他有点“咬文嚼字”、“烦琐考证”，后来，才逐渐体会到其中的奥妙和深刻。下面两个例子，从一斑可窥全貌。

例一：上文所说的“验前综合判断”中“验前”一词是康德常用的一个拉丁文“*a priori*”的中译。过去有人曾译为“先天”，韦先生认为是错误的，因为“*a priori*”在拉丁文中并无“与生俱来”之意，康德用这个词更无此意。韦先生在译此词时，先译为“先验”，后一再琢磨，觉得也不妥当。因为在康德著作里多年来已用“先验”来译德文的“*transzental*”，如果再用它来译“*a priori*”，就混淆不清了，于是他反复推敲，最后决定创造一个崭新的词语“验前”来译“*a priori*”。从字面上看，二者似无甚区别，实际上却大不相同，因“验前”更符合康德的原意。韦先生在“文革”中

曾专为此写了一篇文稿给我看过，可惜，当时正“兵荒马乱”，我实无心拜读，如今人亡稿失，悔之晚矣。

例二：五六十年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说康德是个反对科学知识的信仰主义者，说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过：“我否定知识，以便给信仰扫清地盘。”韦先生认为，这根本不是康德的原意，这句话应译为“我要扬弃知识，以便替信念留有余地”（上两处重点都是本文作者加的）。即用“扬弃”代替“否定”，用“信念”代替“信仰”。“扬弃”乃德文“aufheben”之译，其含义较复杂，意指“把某个东西从不属于它的领域中排除，抓住它、保存并加以发扬提高”，英文错误地译为“deny”，国内有人据英文而译为“否定”，跟着别人犯错误<sup>①</sup>。

至于“信念”与“信仰”，韦先生说德文“glaube”一词在康德著作中，如果论述一般问题时是指“信念”，而只有专门讲宗教问题时，才意指“信仰”。康德在这里谈的并非宗教方面的问题，故应译为“信念”。可见，康德既未否定知识，又未给信仰扫清地盘。就这样，韦先生更正了两个词语的误译，为康德在中国的“错案”平了反。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正如韦先生说的，他在翻译时“以信为主”，用尽心思忠实于原著，而不像有些译者为了追求“达”、“雅”而不惜损伤原著本意。为了更忠实于原著，他始终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译文，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正如他所说的，做学问一定要有一种“主见不可无，成见不可有”的独立与创新精神。这对一位耄耋

<sup>①</sup> “aufheben”在各国文字中均无恰当的词来译。抗战时期，我国曾直译为“奥伏赫变”。当时我还在读中学，不解此词的含义，误以为是“辩证”之意，但总还没有误为“否定抛弃”之意。苏联学者古留加在《康德传》一书中说，俄文有的译为“消灭”，有的译为“限制”，他本人则译为“抬高”。实在有点混乱了。

老人来说，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第四，韦卓民决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个人爱好和兴趣而著书立说，乃是为了一个宏伟的工程而奋斗终生的。这个工程就是营造一座宽广而坚实的贯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早在 70 年前，他已明确了这一奋斗目标。1928 年他在伦敦所作的一篇演讲词中声称，融合异质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而在当时的我国，“融合中西文化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而必须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他还旗帜鲜明地申明：在吸收西方文化时，我们反对妄自尊大的“保守派”，也要反对崇洋媚外的“洋化派”。如果说，解放前他在融合中西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在国内办教会大学、宣讲基督神学和在国外讲解与介绍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话；那么，解放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哲学史的译介上来了。原来，他研究、译介康德哲学正是站在这个高度来进行的！他常说：我们要在学习西方哲学时做到取长补短，以便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哲学。他在 50 年代就曾多次说过：在欧洲，有些小国都翻译、出版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大师的“全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一套，这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他立志要弥补这一缺陷。本来他已具备优越的主观条件，既“通晓古今”，又“学贯中西”，仅外语就精通英、德、法、俄、拉丁文等七八种。可他并不满足，仍自谦说“差距很大”。其实，他是在鼓励我们努力奠定扎实的功底，以铺设他理想中的“桥梁”。他还认为，在介绍西方文化、西方哲学时，要避免把西方的观念“解说成中国的观念”，过分追求中国化、通俗化，以致把人家的文化变质变味。我体会的意思是，在学习康德这样的西方哲学时，一定要力争学到原汁原味的康德思想；要努力体验领会德国语言的特征及其文化背景；设法逐渐领会康德的思维方式从而弄懂其实质，真正做到沟通中西、

优势互补。当然，要真正切实地做到这些，确实是极为困难的。

最后，我代表“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全体成员，由衷地欢迎“韦卓民：康德哲学著译系列”<sup>①</sup> 即将陆续问世，我们的宿愿得以逐步实现，可以告慰韦先生在天之灵了。在这里，再次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谢意。

曹方久

1999年3月于桂子山

<sup>①</sup> 本系列含三类内容：一、韦卓民撰写的对康德研究的著作、论文；二、韦卓民翻译的康德原著；三、韦卓民翻译的西方其他学者关于研究、讲解康德哲学的著作。共18本（篇），其中有的是经过最近整理遗稿后首次出版，有的是重版，有的是修订版。

## 中译者前言

本书是从裴顿（H. J. Paton）1936年英国伦敦出版的《Kant's Metaphysic of Experience》一书译出的译本，标题为《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作者裴顿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并曾任该大学皇后学院的研究员。该书的副标题是“**A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Half of the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兹译为“《纯粹理性批判》上半部注释”。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名著早就受到我国哲学研究者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西洋哲学研究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大力普遍展开对于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与思想家进行研究与批判，而作为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的康德当然不能例外。我们都知道康德的哲学思想在欧洲，乃至在全世界，其影响之广，以及遗毒之深，是十分厉害的，所以就格外要予以严格而尖锐的分析与批判。可是，要进行这种艰巨的工作，势必从研究康德的原著入手始克有效。

康德在18世纪的德国，毕生从事教学与著作，其生前与死后刊出的大大小小作品不下两百多种，但是主要的还是他有名的三种《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其余的如他的《1770年教授就职论文》、《未来形而上学导言》、《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步》、《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和他早年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等书，只可作为参考而已。然而，研究康德的三种《批判》的人们，每每又是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入手的，而虽然这书不能与其他两种《批判》孤立开来看，但是想要理

解康德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他的方法论与认识论部分，我们是必须好好地掌握《纯粹理性批判》的概要的。

可是，康德的著作之中，除了他的《判断力批判》之外，《纯粹理性批判》可能是最难读的，其原因不但是由于这书的原用德文极其麻烦复杂，不易理解，正如裴顿在其《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一书的序言里所说：“由于缺乏一种详细的注解，结果便是关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种种学说，不免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乃至……对于康德的词句，究竟是作何解，都是莫名其妙。”原德文本是这么难读，而翻译本则每每更有甚焉。所以，要有某种比较详明的注解，是为研究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人所必需的。

19世纪的最后20多年，在德国曾有花亨格尔（H. Vaihinger）、阿迪克斯（E. Adickes）等少数几个研究者作过这书的某种比较详细的解释，但是对于我国的哲学工作者来说，由于语言的隔阂，还是没有多大帮助。

英国的康德研究者凯尔德（E. Caird）在1889年曾刊出过《伊曼努尔·康德的批判哲学》一书，两巨册。对于某些问题讨论得极为详尽，但是这位作者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观点来谈康德的思想的。关于这种做法，我本人在这里姑且不提出具体的意见，以后当有关于这个题目的专论，而目前只想说，用黑格尔的观点来解释康德，难免有歪曲康德之虞。所以凯尔德的这部巨作，作为参考则可，而作为帮助我们去真正理解康德，则似乎不可。可是，这只是一己之见，不能作为定论，而且与目前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

近40年来，从康德的著作本身来了解康德的思想的一些论述，刊成为书的比较以前为多。据我本人所接触到的来说，有两种用英文写出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解义或注释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是苏格兰康蒲·斯密（Kemp Smith）1918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曾为本译者译出，于1961年2月以笔

名绰然，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内部读物。康蒲·斯密有鉴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某些地方不易理解，而且认为实质上是自相矛盾，至少是前后不一致的，乃努力于正文的详细考证，沿用德人花亨格尔在其《注释》所采取的所谓“凑合说”，认为《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是康德仓促间凑合历年各时代所写的手稿，未遑加以仔细地整理而编成的。这种见解不无说服人之处，虽然我们对之是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的。至少从校勘的观点来看，康蒲·斯密氏把该巨帙中的某些段落，甚至某些个别词句，按其认为是所属的前后不同的年代清理出来，从而加以解释，这种工作，对于注意考证与校勘的读者来说，不无相当的贡献。但是，这部《解义》虽然关于原德文的字句曾详加核定，以便读者理解译文，然而对于书中所用的名词，所碰见的某些观念，还是没有进一步地明白解释，而今译的裴顿《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其副标题为《〈纯粹理性批判〉上半部注释》一书，是旨在弥补康蒲·斯密的《解义》所遗留的缺陷的，因之这两部注解可说是互相补助的。

在校勘上，裴顿是力辟花亨格尔与康蒲·斯密所主张的“凑合说”的。他肯定地说：“我看不见任何理由来假定康德在任何时候使用什么笔记而不加以重新整理的。”（见裴顿原书上册，pp. 39-40）他并引用波鲁斯基所谈到康德写作的方法为证（见原书上册，p. 40）。这是裴顿氏在谈到《纯粹理性批判》里的“先验演绎”时所说的。但是，在别处有关于同样的问题，他也是持这种态度来驳斥“凑合说”。我们可注意他在这里用“康德在任何时候”这种概括的字样。

谈到《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内容，裴顿氏以《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为他的这部注释的标题。“经验形而上学”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会记得，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里，谈到纯粹理性的问题时，曾提出过“怎样可能有形而上学的科学”，如同我们在

事实上有纯数学与纯物理学那样的这个问题。他的答复就是，他以前的那些各种形而上学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们都是以为用人们的知性或理性是能认识到事物如它们在其本身那样，而不但是如它们对人类的心所出现的那样的。可是，他反复地说明这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人类的知识能力是有其一定的限度的，就是说，关于客观对象的知识必须有感受性接受外来的直观为其质料的基础，而又有知性的范畴，或更确切地说，有知性范畴的图型，来给这种质料以其能使人理解的形式，如果二者缺一，都是不能有关于对象的客观知识的，所以说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其限度的，而这也就是人类经验的限度，超出这个范围，人类就绝不能有知识可言，最多不过是一些信念而已，而信念不是知识，因为它不一定在人类经验里有其确实在时间与空间里的可指定的对象。康德认为，在他以前的各种纯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失败，就是因为它们没有认识到人类认识能力的这种局限性，而冒昧地去谈在有经验以前的知识，那就是一种捕风捉影的举动，毫不能有实际上的效果。

但是人类知性有其范畴，这是早就在欧洲的哲学里所承认的一种概念。康德理解“范畴”为“终究的述项，普遍地而又必然地适用于每一个就其为事物而言的事物。作为普遍性的而又必然性的来说，范畴乃是纯粹的或说验前的，而且我们可以称它们为‘一种一般的事物的纯粹概念’”（见原书上册，p. 257）。“如果我们假定事物为自在之物，则没有可能在验前知道这些事物的普遍性而且必然性的性格。我们用范畴就能有验前的知识，只有范畴如果是由于心的性质而且又是为心加在它们知道的对象之上的。”（见原书上册，p. 257）于是，裴顿就关于经验形而上学作出这个断言说：“所以康德的形而上学，一方面保留着过去的形而上学的一些理想，而另一方面它再不是和实在之作为实在有关的一种思辨的形而上学了。它改变为一种关于经验的形而上学，而有关于经验的对象之就其为经

验的对象而言的种种普遍性的而且必然性的特征。”（见原书上册，p. 258）用作者自己的话语来说，这就是“经验形而上学”的意思。

可是，作者认为他的这种说法完全是由系统地理解康德自己的学说而来的，是以康德自己的各种著作为根据的。作者一再声明：“如果我们要了解康德，我们就必须让他用他自己的方法说出他的问题来，而且我们又必须设法看明白这问题是什么。”（见原书下册，p. 28）而且，他又具有信心地认为：“只要我们愿意集中思考在他的学说上面，而不是咬文嚼字地去理解它，康德本人所述说的，其本身是比较易于了解的。”（见原书下册，p. 40）这样来注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比较科学的、公允的，而且作者在书中的各处都写上了“我不明白”，“我觉得有问题的”这种感觉，然而却并不去强求理解，这可说是他的严谨态度的表现，读他这书的例如第五十六章第二和第五这两节便知。

依本译者个人来说，这部注释帮助我来弄清楚关于这部《批判》中的某些用词和某些观念的地方是很多的，兹举出下列几种为例。

首先，我们常常觉得很难知道《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与其第二版的主要差别是在什么地方，而作者认为是“强调的不同，虽然那新的说明显出一种加强的倾向，把空间几乎与时间同等地对待，而且倾向于把想像力描述为在更低水平上起作用的知性”。这种以及其他提示是不无启发性的。

有人认为康德过分地在这部《批判》里硬把感性与知性分开了。当然，稍微仔细点读过这部《批判》的人都不会有这种误解，而作者特别在他的书第五十六章第七节结尾处（见原书下册，p. 460）指出：“感官与知性、直观与思想，在我们一切的知识里的根本区别和必然的合作——这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中心而又最重要的学说。”而且，这个结论是经过详细反复的讨论后作出的。

认为康德是把人类的各种知识能力生硬地割裂开来，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其实，在裴顿这书的索引里有 35 条是关于“综合”的。康德在这部《批判》里所强调的乃是综合、结合、统一性，而不是其反面。

余如“验前”、“先验”、“超验”等名词，像“出现”、“对象”、“现象”、“本体”、“自在之物”等名词一样，是使读者常常感到难以确切地来理解。然而，如果要明白康德到处所说的是什么，又是不得不确切地理解的。关于这一切的名词与其意义，本注释都反复在各种前后文里加以说明，翻阅本书的详细索引便知。

还有，在这部《批判》里有“数学的范畴”与“力学的范畴”、“数学的原理”与“力学的原理”，而康德又声明他在这些联系上的所谓“数学”与“力学”并不是通常的“数学”与“力学”，但是究竟是指什么说的，我们初读《纯粹理性批判》时，不免觉得头痛，不得其要领。而裴顿的这部《注释》却有比较易懂的说明，看原书的下册 pp. 101-103 便知。关于常为甚至逻辑家所弄不清楚的（如约瑟在其《逻辑导论》里第七章后段关于“判断的各种形式”那样）“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问题，本注释在其第十四章第十节里却几句话便说清楚了。至于范畴何以止于那么多，这也是一个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问题，而这部《注释》在其上册 pp. 293-297 里是解释得比较令人满意的。

还有，“自在之物”这个观念是难掌握的。我一向觉得这个译词与其他翻译原德文 Ding-an-sich 的用词，都有点不妥，而由于多年的习惯，亦只得采用“自在之物”这个译词。但“自在”原是一个含有深意的佛学翻译名词，与康德所用的 an sich 是有区别的。他的所谓 Ding-an-sich，依我的个人意见，似是“从事物的本身来说”的意思。有人用拉丁文的“per se”来翻译它，是确切的，但是把 per se 译成我们的汉语，岂不是同样有困难吗？要紧的却是要